

TIME
LIFE

WORLD WAR II COLLECTORS EDITION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中立国

〔美〕丹尼斯·J. 弗德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沈建冬

著
译

THE NEUTRALS



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典藏本

TIME
LIFE

美国时代生活版

WORLD WAR II COLLECTORS EDI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中立国

[美] 丹尼斯·J. 弗德 著
及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沈建冬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1941年，因纳粹侵略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坐在里斯本一个路边咖啡馆里无聊地打发着时间。中立国葡萄牙的首都不仅成为了国际难民中心，更成为成千上万欧洲人逃离被占家园的安全通道。



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中立国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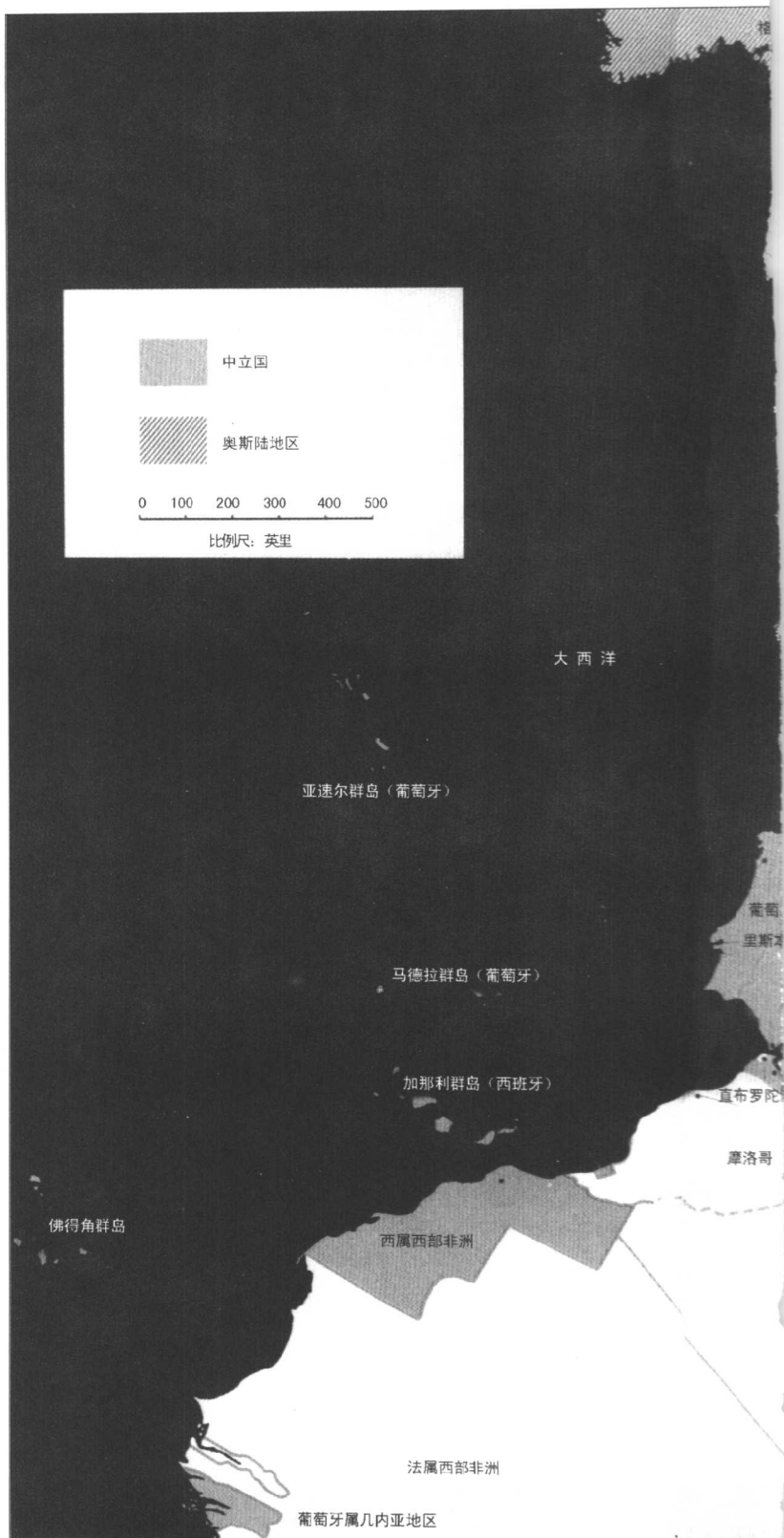
章节

- 1: 黯淡的前景 / 8
- 2: 永久中立国 / 46
- 3: 钢丝绳上的独裁者 / 76
- 4: 瑞典: 战争晴雨表 / 120
- 5: 两个顽固的不合作者 / 166

组图

- 全副武装的瑞士 / 28
- 西班牙的痛苦遗产 / 64
- 奔赴反共前线 / 92
- 中立的代价 / 106
- 北方的天堂 / 140
- 活跃的爱尔兰 / 154
- 红十字会的仁慈 186

在二战期间宣布为中立国的各个国家都尽力讨好交战国。有一小部分中立国为避免卷入战争，宣称自己为和平的飞地。有七个国家，即所谓的奥斯陆七国也试图把它们划为中立区域。但是它们的意图很快地与主要参战国发生冲突。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均遭纳粹德国侵袭。芬兰两次遭苏联攻击。在这4个国家中，只有瑞典巧妙地隐藏了它的矿产资源，同时又遵从军事命令，保持中立。欧洲的其他国家，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爱尔兰都竭力避免冲突扩大，每一个国家都紧张地与同盟国和轴心国保持和好。





1

黯淡的前景

国王发布寄予希望而又焦虑的消息
因恐惧而走到一起的国家
逐步恶化的“君子中立”
挪威“没有外交政策”的政策
英国舰队的盲目自信
丹麦“有什么用”的态度
荷兰决堤泄洪的残酷计划
纳粹的神经战
最后警告：“抓紧明天的黎明”

1939年8月22日下午晚些时候,来自六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及其随行人员先后抵达布鲁塞尔机场和火车站,坐上等候在那里的轿车,前往大都市酒店。他们在比利时首都的社交活动和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当晚,外交官们聚集在比利时外交部大厅,出席比利时外交部长休伯特·皮埃罗特的欢迎宴会。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他们在著名的外交部红房办公室里召开工作会议,只在中午稍作休会,在外交部餐厅就餐。傍晚,他们又匆匆赶回大都市酒店,换上外交官礼服,前往拉肯古堡,出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为他们举行的国宴。

会见宾客时,国王没有穿晚礼服,而是身着武装力量总指挥的制服。他闲聊一会儿,然后走向麦克风,向全世界宣布一条寄予着希望,又令人忧虑的消息,这是他的六位贵宾和外交部长皮埃罗特准备的。

“不信任和怀疑围绕着我们,”利奥波德用他缓慢、纯正的法语宣布,“目前,工事在修筑,军队在集结,可怕的战争即将打响。”国王说道,“欧洲正走向自我毁灭”,“小国担心成为牺牲品”,尽管它们“强烈要求中立”。

利奥波德是代表奥斯陆七国发表声明的,七国外长刚结束又一轮的紧急磋商。这七国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以及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促使七国走到一起的不是条约、不是贸易,也不是共同的科学和文化利益,而是恐惧。在恐怖笼罩的三年里,奥斯陆七国的外长们穿梭于北欧,寻求在迫在眉睫的战争中保存自己的途径,而这种途径就是中立。

在同德、法、英领导人的会谈中,奥斯陆七国外长体会到欧洲日益升温的备战态势:德国正调动大量军队,法国作了部分战争动员;英国对舰队发出了警报。对此,他们深表遗憾,并号召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但英法告诫他们,和平取决于德国;而德国又把责任推给英国,他们发现自己扮演了一个不讨好的角色。一位瑞典记者将他们形象地喻为“不

邀而来,不谢而走”的客人。伴随着外交努力的失败,他们试图确立一种中立政策,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了受国外牵连的担心,另一方面满足了他们共同抵御战争威胁的需求,可这种努力终归是徒劳的。

在二战前夕各国纷纷寻求中立,其中奥斯陆七国以挪威首都命名,1930年,七国的代表在这里首次聚会。在一系列会议上,七国外长提出了同样令人担忧的问题:如何保持贸易往来,如何确保战时食品供应,如何阻止军队或飞机过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生存。这也是所有欧洲国家乃至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正在关注的问题。国王预见到的恐怖风暴正在形成,无人确信中立这把保护伞能够使他们免受袭击。然而,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惟一救命稻草。

正如历史学家罗德瑞克·欧格拉指出的,中立政策的矛盾是,它的目标是不介入战争,但只有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它才能得以评估和界定。更深层次的矛盾是,严格的中立政策要求完全不偏不倚,而二战中成功保持中立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其行为是有偏向的。无论成败与否,各国都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在全球战争中,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和交战国一样,中立国以不同的方式,或是在经济上,或是在意识形态上,或是在政治上卷入二战,并且成为敌对双方战略计划的重要棋子。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观察家可以通过他们的政治沉浮推测战争进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远离战火,但在欧洲只有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爱尔兰、土耳其六国维持了中立,在整个西半球,只有阿根廷严守中立。他们执行中立政策是由中立国求生的环境塑造的,当然也要归功于将近500年的中立传统。

1934年,美国外交家艾伦·W.杜勒斯观察说:“当大街上的人提到维持中立的必要性时,他的意识仅是美国应避免卷入战争。”事实上,中立的含义远不止这些,中立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要设法求得生存。中立国走的是一条荆棘之路,必须在自己的

物质需求和交战国的战略意图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让交战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中立并不像杜勒斯提到的“街头路人”的理解那样简单,它是折中的产物,非常脆弱,易被权力政治所破坏。

15世纪晚期,大国有了解决棘手的中立问题的最早记录,一系列航海条约规定了中立国船只运输货物通过战时军事封锁的具体条件。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宣称中立的国家几乎被看成是不受拘束的盟友,它们出于各种理由,不参加战争也不支持盟国。在松懈的法规下,出现中立国帮助交战一方而不受指责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这样一种良好手段,有时候被称为“君子中立”。当战争扩展到周围的整块大陆和海洋的时候,“君子中立”就难以实施了。19世纪早期,拿破仑战争行将结束时,大国要求中立国不偏不倚,不得存有偏见。在此后的条约和协议中,特别是20世纪初的海牙会议,欧洲政治家制定了中立的基本规则。在理论上,这些规则迄今还是指导中立政策的法律准则。

根据1907年的海牙会议精神,一国正式宣布中立后,其领土不受侵犯,并且有权与交战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中立国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中立国不能允许任何交战国使用其领土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行为,尊重交战国实施的军事封锁和禁运,不向任何参战国派遣部队,输出军用物资,提供军费。海牙会议签订的条约重建了中立政策的权威性,使弱小国家确信,只要他们严守中立规则,就不会受到侵犯。

1914年8月4日,中立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轮大举进攻中,德军的铁蹄横跨中立国比利时的边境。随后动荡的四年时间里,中立的权利被彻底践踏,许多政治家认为中立已毫无价值,为此他们取消了海牙会议的各项相关规定。1917年,美国参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直言不讳:“当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遭到损害时,中立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可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立的基本原则再次遭到质疑，特别针对国联。国联是根据集体安全和集体道德责任的原则建立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对急于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的欧洲小国来说，起初加入国联是理想的方式，当战火燃起后，国联可以成为一道安全屏障。但不难发现国联的目标和中立的目标相距甚远。早在1920年9月，国联理事会就宣布“成员国的中立设想与其他原则是不相容的”，国联的所有成员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条约的权威性。国联要求一旦战争爆发，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支持正义一方，采取军事行动或经济制裁抵抗侵略者。

瑞士的行为很快挑战了国联的有关规定。瑞士声称，如果他们参加国联行动，抵抗侵略，将违背中立传统以及确保他们几百年安全与繁荣的不介入原则。国联勉强采纳了瑞士的建议，修改了规则，又用模糊的措词规定，“当国联的最高原则遭挑战时”，瑞士“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如何处理成员资格与许多成员国的中立政策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尚未正式解决。由于中立国渴望国联这把保护伞，而国联试图扩充其规模，成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事实上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妥协。

1935年秋，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三个月后，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非军事区。不仅国联内部中立主义的一般原则遭到践踏，而且国联这道保护弱小中立国的屏障也被彻底撕毁。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行径猖狂至极，法理和道义荡然无存，任何有正义思想的国家都不能熟视无睹。“中立作为一项政治原则已经终结”，在特别时期，英国生物学家和作家朱利安·赫胥黎说，欧洲小国已决定“放弃中立政策”。

侵略者对中立毫无顾忌。德国学者把中立等同于软弱，庆幸在德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德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斯坦丁出版了《德意志帝国和病态的欧洲文化》一书，引起广泛关注。书中，他把瑞士的

中立政策描述成“道德病”，是意志薄弱、贫乏和衰老的表现。

同样令中立国失望的是，国联这把保护伞非常脆弱。1933年，德国退出国联，后又公然藐视国联，不顾可能遭到的制裁，重新武装莱茵非军事区。一位纳粹作家写道：“日内瓦太太脸上这层遮掩缺陷的面纱被撕破了。”奥斯陆七国布鲁塞尔会议一周之后，战争于1939年9月爆发了。战争初期，只有德国、波兰、法国、英国（得到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南非支持）四国参战。一些政治家仍抱有幻想，认为战争能够节制，但国联形同虚设，战争很快全面爆发，许多未被授权的国家不管它们表达过何种意图，最后都卷入战争了战争漩涡。

在1939年，美国和苏联还高唱中立，但两国最终成为最强大的参战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向美国公众保证，他将警惕那些破坏中立的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向国会强调：“美国任何时候都不会与联盟纠缠在一起。”

莫斯科方面，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集党内重要人物，认真地告诉他们：“苏联是一个中立国家，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不感兴趣。”他坚持声称：“只有战争贩子才习惯于利用别人，进行火中取栗的勾当，苏联领导人没有这种作风，我们不会被拖进由战争贩子挑起的冲突。”当然，苏联人正在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9月份，苏联军队入侵波兰东部，和纳粹瓜分这块不幸的土地，两个月后苏联人将进攻芬兰，这是他们垂涎已久的。但克里姆林宫对英法抗击德国还表示中立，没有迹象表明苏联会改变政策。美、苏都是在遭到突袭后才真正加入战争。1941年夏，苏联加入同盟国，但苏联还是继续执行选择性的中立政策，宣布对日本保持中立，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

如果希特勒不把装甲部队开往苏联，日本不轰炸珍珠港，历史不知将会怎样发展。美国和苏联都很强大，能够自给自足，可以置身事外，但战争的结果

将无法估计。另一方面,弱小的中立国能选择的余地更少,施展策略的空间更小,一旦战争打响,它们将受到两方的压力而放弃或调整中立政策。

交战国的施压有多种形式:或者直接要求中立国同交战一方结盟,或者要求中立国给予通过其领土的权利,或者强迫中立国限制或放弃战略物资贸易。中立国受到压力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些国家拥有交战国渴望得到的地理位置,如战略航线上的港口,作为陆地间“踏脚石”的岛屿;一些国家拥有交战国生产军用物资必须的原材料;一些国家更不幸运,仅仅是因为在交战国军队的必经要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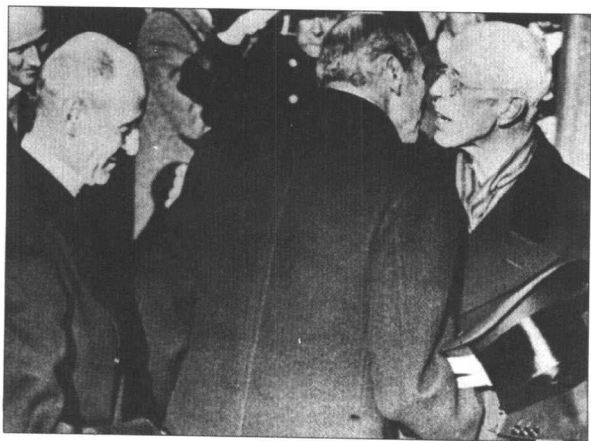
挪威是最早放弃中立的国家之一,奥斯陆国家曾在其首都进行首次会见并宣布他们的和平主义。到1939年,挪威已经享受了125年的和平。当被问及外交政策时,挪威人喜欢引用他们伟大的诗人、政治家贝耶尔森的观点:“最好的外交政策就是没有外交政策。”

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其天然的地理条件。挪威是一块寒冷、多山、孤立的陆地,领土面积119240平方公里,1/3的领土位于北极圈内,适宜耕种的土地还不到3%。因此,挪威不能通过本国农业养活300万人口,而严重地依赖渔业和海运,被迫进口大部分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这种情况使得挪威经济在战时特别脆弱。

由于远离欧洲紧张事态的中心,挪威富有安全感,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没有加强防御力量。他们认为,加强军备只会损害他们的中立政策,剥夺用于社会和经济福利计划的费用。谁会攻击他们呢?不像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和苏联有良好的传统关系,1905年和瑞典的政治联合解体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挪威独立的大国。至于英国,挪威信奉其民主制度,一位挪威首相曾宣布,“我们信赖英国”,并把这作为他对外政策的基石。

挪威对德国有些怀疑,但挪威政治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德国军队并非对挪威中立的重要威胁。此外,很多挪威人与德国人有密切的个人和文化关系。20世纪20年代,德国遭遇可怕的饥荒时,挪威家庭收留了几千名德国孩子。30年代,一种二元文化结合的“北欧日尔曼民族聚会”在德国非常盛行,邀请杰出的挪威人参加,而德国的演讲者、演员、歌手、科学家也经常前往挪威。除了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外,英国舰队也为挪威增加了安全感。只要大英帝国控制着北海,挪威人无法想像德国会从海上发动攻势。

二战前夕,挪威只有一支13000人的军队,而且装备落后。挪威军队没有坦克和反坦克炮,没有防空炮。海军只有几艘服役年龄很久的军舰负责沿海防务。战争部长为布置在沿海战略要地的五个要塞骄



1939年秋,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君主会议,81岁高龄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右边一位)欢迎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左边一位)和丹麦国王克里斯丁十世。皇室聚首象征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联合和中立的决心。

傲,实际上一旦敌人登陆,他们的炮火不堪一击,又缺少步兵的支援。

比缺乏军备更严重的是,挪威将领的军事思想已经完全过时,评论家嘲笑一位将军说,“他的思想是为以前的战争准备的”。挪威军队的参谋长没有注意到德国已建立了一支全新的适应性更强的海军。新的德国海军装备有精良的潜水艇和水面舰艇,得到陆上空中力量支援,特别适合沿海作战。在评估承受战时经济压力的能力时,挪威又错误估计了形势。此时,英国已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战略措施,而不是过去的“协议封锁”。英国在一战期间实行军事封锁时,允许中立国根据协议进口一定量的商品。中立国取得商品后可任意处置,不受英国控制。

二战中,英国要求运往中立国的每船货物都要有证件,不仅要证明货物在允许的限额内,而且要说明货物的用途。这种证件就是大家熟悉的“准运证”。这样,中立国必须承担起责任,在通过同盟国的封锁之前,必须有效证明这些货物不会转运到德国。

1939年9月1日,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宣布中立后,德英两国马上承诺尊重挪威的中立地位。但几周之后,双方都违背了承诺。英国担心瑞典的铁矿石从挪威北部港口那尔维克运出,通过由岛屿屏蔽的挪威水道进入北海,然后运往鲁尔区的兵工厂。早在9月19日,英国就考虑在挪威水道布设地雷,迫使装运铁矿石的船只转往公海,在那里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实施拦截。由于哈康国王向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恳请,避免了这次对挪威中立地位的公然侵犯。

英国转而开始迫使挪威签订一个商业协定,相当于控制挪威的对外贸易。英国不但希望增加自己同挪威的贸易,特别是在鲸油和渔业产品方面,而且坚持开列一个违禁品清单削减大量的挪威同德国的贸易。为切断货物转运到德国的任何可能途径,英国甚至宣称有权控制挪威同其他中立国的贸易。当挪威强烈谴责英国侵犯其中立地位时,英国粗鲁地警

告,最终,挪威的全部国际贸易都将在皇家海军的许可下进行。

对英国的这种无礼态度,挪威深感震惊。同时,德国也施加高压政策,要求挪威给予更大的贸易特许权。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间,德国在挪威领海炸沉了51艘船只,造成357名挪威人丧生。当挪威指责德国违反国际法时,德国方面并未提及挪威的中立地位,而且无动于衷地指出,根据德国刚宣布的新规则,任何船只为避免鱼雷而绕行的可疑行为,无论在领海内外,都会立即遭到攻击。

但是,一段时期内,挪威采取灵活手段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他们依赖古典的中立国策略,在交战国之间施展平衡术。挪威手中的一大筹码是它的商业船队。得知英国急缺船舶后,挪威答应只要英国放松禁运,让它能提供德国所要的更多货物,就将他们船队的一半租借给英国。最后,英国勉强同意了。

通过这样一种三方交易,最后三方各取所需。英国取得了10艘挪威油船的使用权,作为回报,英国准许挪威向德国增加出口5万吨渔产品,德国向挪威提供40座过时的防空炮,援助挪威的防御。挪威人颇为满意,私下把这种交易称为“大炮换鱼”协议。

但是挪威人高兴得太早了。1939年11月,苏军入侵芬兰,挪威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站在芬兰一边的英法,看到冬季攻势是理想借口,同盟国可趁机干涉挪威,直接控制途经挪威水道的航线。于是,英法以帮助芬兰为名,要求自由通过挪威和瑞典。丘吉尔曾自信地说:“挪威和瑞典的反对意见现在可轻而易举地否决了。”

瑞典和挪威都断然拒绝了英法的要求。挪威首相约翰·尼高斯沃尔强烈反对外国力量进入挪威,发誓要撤走英军登陆地点的所有运输工具。挪威外长哈尔夫丹·库特表现得稍委婉,他解释说,这不仅不符合中立法,而且有可能把挪威变成大国作战的战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凌晨3点,苏联驻奥斯陆大

使就打电话给库特，警告说，如果挪威介入，那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德国外长也警告他，挪威将会受到报复，事后还幸灾乐祸。

1940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挪威的处境更加危险。芬兰战争后，不仅英国开始考虑入侵挪威，德国也产生兴趣。在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提出的计划中，建议在挪威沿海建立军事基地，向北扩大德国海军的作战范围。如有可能，雷德尔想通过谈判取得基地，必要时使用武力。起初，希特勒未予重视。苏芬战争爆发后，英国干涉挪威的可能性增大，希特勒开始详细研究这一计划。雷德尔写给希特勒一份备忘录，指出：“挪威不会落入英国之手十分重要，英国的远征军借口进入挪威，暗中实施占领，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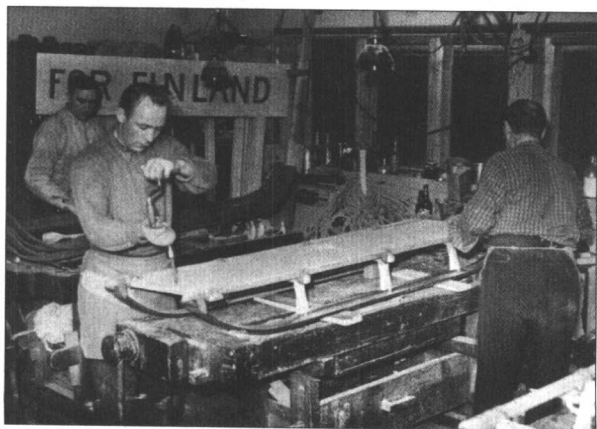
维德昆·吉斯林的口供使德国感到更加紧迫。维德昆·吉斯林是位有野心的政客，在挪威仿造了一个小规模的法西斯政党，几年来，他一直试图取得纳粹的秘密支持。1939年11月14日，吉斯林正式见到了希特勒，告诉他挪威议长卡尔·汉布罗领导的一个亲英小党派正密谋让英国在挪威建立军事基地。如果元首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自己将通过军事政变接管挪威政府。

吉斯林是在下午5点拜见希特勒的。6点，希特

勒总司令部发出命令，准备突袭挪威和丹麦。后来的计划叫“威塞尔演习”，以不来梅哈文港口外的海湾命名，德军正是从这里起航的。

英国也正考虑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担心德国可能随后进攻，丘吉尔认为英国放弃面子的时机到了。不管挪威是否反对，英国都将在挪威水道布设水雷，针对德国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报复，英军准备迅速进入挪威。丘吉尔强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当我们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战时，小国不能束缚我们的手脚”。挪威外长被英国的态度激怒了，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警告。他告诉在奥斯陆的德国外长，丘吉尔仅是个“煽动者和好说空话的人”。

影响英德策划者的另一因素是挪威对所谓的“阿尔特马克”号事件的反应。“阿尔特马克”号是为德国海上战舰提供给养的补给舰。1940年2月16日，它给小型主力舰“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提供补给后，在返航途中经过挪威海域。“阿尔特马克”号舱内有300多名英国船员，“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炸沉他们的船后逮捕了他们。为此，一支英国海军舰队强行登上“阿尔特马克”号，释放了船员，完全不顾出事地点两艘挪威鱼雷艇的反对。英国公众为此次行动欢欣鼓舞，而德国表示严重抗议。但事件的关键在于德国确信英国急于破坏挪威的中立。事件同



奥斯陆的工匠正在制作雪橇。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挪威向芬兰运送了500辆雪橇。芬兰军队使用雪橇运送伤员过雪地。

美洲亲轴心国的中立

日本偷袭珍珠港改变了西半球的孤立和中立态度。之后几周内,21个拉美共和国中的19个要么断绝了与轴心国的关系,要么加入美国阵营宣战。到了1942年秋,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与美国联手保护盟国船只,防止德国潜水艇攻击。除了南部的智利和阿根廷,轴心国的间谍在南美四处遭到追捕。

但是,美国助理国务卿索姆奈·威尔斯称,有些国家仍然允许轴心国官员和颠覆者在其领土上从事打击他们邻国的敌对行动。1943年,反间谍人员在法尔巴拉索披露了一名纳粹间谍的电话,内容是向德国潜水艇汇报盟国船

只的行踪。智利却迟迟不逮捕轴心国间谍,不断绝同轴心国关系。

阿根廷也是个离群的国家,不和她的姐妹共和国走在一起。她和欧洲的传统、贸易和移民关系比美洲更加密切。在阿根廷,早期欧洲定居者最终屠杀或驱赶了他们发现的所有印第安人,而不是同化印第安人,他们的后裔也设法远离混血种。晚期的移民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保持着欧洲性。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有1/3的居民拥有外国护照。在一些省份,德国定居者统治着整个城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教育体制是纳粹模式的殖民地翻版。

大部分阿根廷人偏爱盟国,但也有少数强烈拥护纳粹反犹太

主义和种族优越性的信条。德国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军队按德国命令行动,与希特勒军团步调一致,军官期望轴心国胜利。阿根廷同西班牙长枪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存在着密切的种族和政治关系,民主传统被腐蚀。军政府的野心取代了美国的影响,支配了西半球的南半部分。

出于这些原因,阿根廷统治者执行了一条亲轴心国的中立政策,抵制美国团结西半球的努力。整个战争期间,阿根廷成为法西斯的一个前哨,成为被其他南美国家逐出的轴心国间谍的避风港。即使到1944年,盟国促使阿根廷向德国宣战以后,情况还是如此。



1942年,在阿根廷第一法西斯民族政党联盟的青年集会上,成员们站在象征纳粹之鹰的安第斯兀鹰下。

时向英德表明,挪威无力也不想积极维护中立政策。

“威塞尔演习”计划已成为德国最高司令部最优先的计划。希特勒叫嚣:“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丢失瑞典的铁矿石,如果失去了,我们将不得不用木棒作战。”3月底4月初,挪威收到很多警告表明危机迫在眉睫。驻英国的挪威外交官发来电报,英国正准备在挪威水道布雷。从挪威驻德国大使来的消息说,德国的入侵近在眼前。更明显的征兆来自德国驻奥斯陆大使布罗伊尔博士。4月5日,他邀请挪威政府要员到德国使馆观看刚从德国带来的影片。“客人们感到了恐惧,”哈尔夫丹·库特回忆说,“影片展示了德军攻占波兰的过程,以德国轰炸华沙的恐怖场面为高潮。字幕映出:‘这要感谢他们的英国和法国朋友。’很明显,这在向挪威人表明反抗德国的下场。”

挪威政府无视这些警告,不相信入侵马上就要来临。挪威军队未作动员,沿海防御设施没有任何警戒。针对入侵传言,有人要求询问德国,外交部长库特却不紧不慢地回答,如果传言是假的,询问也无意义;如果是真的,德国会否认。

4月8日早晨,英国官方正式通知挪威他们已经在挪威水道布雷。挪威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对此表示愤怒。会议投票决定迅速清除英国在海面布置的水雷。下午,奥斯陆接到更不安的消息,盟国潜水艇在挪威沿海用鱼雷袭击了两艘德国舰艇,两位身穿灰色制服的德国生还者被挪威渔船救起。他们主动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在挪威政府的要求下”。他们正前往卑尔根港,协助反击盟军的侵入。

匪夷所思的是,库特还是无动于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当国防军总参谋长催促紧急动员时,库特建议两个兵团已足够了。

即使这种有限的回应也来得太迟了。当天晚上,在库特赶回奥斯陆郊外家里的途中,响起了空袭警报。起初,他还以为是一次测试,随着警报的持续,他谨慎起来。回到家中,他打电话给外交办公室。他得

知德国战舰已瞄准了奥斯陆外面的峡湾,沿海的炮台已经开火了。德军进攻后,尽管零星的殊死抵抗持续了两个月,但奥斯陆和挪威南部几天内就被攻占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挪威长期的和平记录起了反作用,给了他们错误的安全意识,并且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纯粹的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而无需武力支持他们的立场。挪威被征服,一方面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对交战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挪威缺乏说服力和足够的力量来维持中立政策,战争双方都怀疑挪威的自我防御能力,并希望首先占领挪威。

美国记者多诺万·理查生于1939年夏来到欧洲,他说:“我发现丹麦人是最厌恶战争的。”丹麦人的态度非常简单。不像挪威人,他们不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可以免遭攻击。他们的历史书用令人发颤的细节提醒他们1864年入侵的普鲁士人是怎样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省的。但他们也不害怕出现一种他们很难控制的局面。丹麦没有组建军事力量,在他们看来,这只会引起攻击。理查生发现丹麦人甚至可以用一种带有宿命论幽默的眼光来看待隐藏的危机。他们也并不掩饰他们对英国的同情,在哥本哈根的书报摊上,充满了英国国王和皇后的明信片。

丹麦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在地理上,连接了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状像伸入波罗的海200海里的绿色拇指。丹麦国土起伏平缓,零星覆盖着森林,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场所,也有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在北部,丹麦港具有战略意义,支配着斯加基拉克和喀得加特两条狭长水道,它们是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门户。在南部,丹麦通过一条30英里宽的地峡与德国接壤,从边境到柏林只有250公里。

丘吉尔也甘心承认丹麦的脆弱。1940年,他对驻伦敦的一组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说:“我不指责丹麦,其他国家至少有一条壕沟,可以把老虎拒之门

外。丹麦紧邻德国,不可能帮它。”他又补充道:“毋庸置疑,在适当时候,德国会毫不犹豫地占领丹麦。”

英国外交家也有同样坦率的评论,丹麦不可能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由于有先期的警告,1939年5月,丹麦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惟一个接受德国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国家。丹麦首相托瓦尔·斯陶宁在这个问题上很有脸面,他声称,条约的签订“加强了我们的中立政策”,我们的国家享受着“特别的安全感”。

丹麦的举动令人质疑,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惟有它在战争爆发后减少了武装力量。尽管军方强烈反对,政府还是在战争的前六个月裁减了一半地面部队,剩下不足15000人。这一奇怪行动,一方面是为

了安抚德国,另一方面出于一种悲观论调。这种论调影响了斯陶宁首相和他的外长彼得·蒙克。1940年1月1日,首相作了一次广播讲话,强调丹麦无力影响事件结果,后来这一演讲被命名为“有什么用”的演讲。

丹麦政府一度成功避免了与交战双方的较大对抗,并维持了相当满意的贸易关系,部分是出于丹麦没有双方急于想要的战略资源的原因。德国曾试图胁迫丹麦终止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由于英国威胁不再向丹麦提供畜牧业所需的浓缩动物饲料,而这会使德国丧失一条重要的食品供给渠道,德国也就作罢了。

随着战争深入,为了尽力不得罪德国,丹麦离英国越来越远。当丹麦的船只被鱼雷击中时,政府非常

